

元末朱、陳鄱陽湖之戰試析

陳俊華

一、前言

元末天下大亂，群雄並起，計有韓山童和劉福通等以紅巾為號起義於潁州，惜韓山童旋即被補遇害，劉福通擁其子韓林兒為帝，號小明王，國號宋，建元龍鳳，聲勢強大，郭子興及其部屬朱元璋皆奉小明王以為召衆。又徐壽輝等亦以紅巾為號稱帝，國號天完，建元治平，此派史稱西系紅軍，以別於小明王之東系紅軍。在西系紅軍之中，要注意的是陳友諒。他本是壽輝將倪文俊之部屬，趁文俊欲謀弑壽輝事敗投靠自己時，將他殺害，並收其軍，積極擴張勢力，後來更弑其主壽輝，聲勢日盛，與朱元璋搶奪地盤，經常發生直接衝突，也就引發明朝開國史上最重要的一場戰役——鄱陽湖大戰。

近代明史專家吳晗曾在他的《朱元璋傳》裡明白指出這次鄱陽湖水戰「也許是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兩軍主力苦戰到三十六天之久，這一次的結局，決定了兩雄的命運。」（註一）事實上，朱元璋於元順帝至正十六年（西元一三五六年）抵定金陵（即今南京，朱元璋改為應天）後，勢力仍弱，格局不大，其東邊則有佔據淮水下游，江蘇東部及浙江北部的張士誠；西邊則有控制江西、湖廣之地的陳友諒。張、陳二人對朱元璋虎視眈眈，朱元璋夾在其中，很難打出天下。但經過至正二十三年的鄱陽湖之戰，朱元璋始奠定日後驅除蒙古，削平群雄，統一天下，建立明朝的開國偉業，因為經此勝利後，他再也沒有遇到能與他匹敵或較為高明的對手了，而且更接收了陳友

諒廣大而富饒的地盤。(註二)

這麼重要的一場戰役，應該在史冊上大書特書才對，可是綜觀古籍，只有《太祖實錄》對此記錄較為詳盡，其他如《明史》、《明通鑑》等大都依據《太祖實錄》而來，而實錄所記戰況對朱元璋讚譽有加，多溢美之詞，不可盡信。倒是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記太祖平漢（陳友諒曾稱帝，國號漢）時，論到鄱陽湖之戰，對其前因後果述說頗合情理，例如他明白指出：「時四方割據，惟友諒剽悍，為群雄冠。」（註三）雖然古籍記載此戰役大都站在朱元璋方面講話，但若能細心分析，亦可在其字裡行間及當時局勢變化的記載中，瞭解朱、陳此次決定對方生死存亡之戰的實際情況。奇怪的是，近八十年來，研究明史的我國學者，並沒有人專就此戰役作深入探討。熟悉明史者如吳晗，亦只在其《朱元璋傳》一書中以一節的篇幅論述鄱陽湖決戰，而且未見深入剖析。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講議》中對此戰役也是寥寥幾行；黎傑的《明史》亦是因襲前人之說。此外，四十一年前魏龍驤在《中央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明太祖鄱陽之戰》的文章，但作者的意見仍未脫離一般舊籍所記所評的觀點，沒有新意。

外國學者對此戰役的研究，以愛德華 L. 德雷爾(Edward L. Dreyer)的〈1363年的鄱陽湖之戰：內陸水軍大戰在明王朝建國中的作用〉(The Poyang Campaign, 1363: Inland Naval Warfare in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一文最為出色。德雷爾以兩萬字左右來詳細論述此次戰役的前因後果，夾敘夾議頗有見地。對《太祖實錄》及時人之記錄也保持懷疑的態度，但卻有時憑「想當然耳」作大膽假設，否定實錄的記載。例如《太祖實錄》記鄱陽湖開戰不久，徐達舟被火焚及後，朱元璋憂慮張士誠或會趁此時應天空虛，乘機來犯，遂命徐達速回護都。但德雷爾卻硬要說成是因為徐達舟隊被創，若大軍與友諒戰不利須撤退時，朱元璋恐怕會被徐達受創的舟隊阻礙行軍，所以才命他返回後方。（見德雷爾本文 p.225）但為何其他受創的舟隊卻沒有返回應天，或離開湖面戰場？可見德雷爾的猜測沒有甚麼根據。不過，外國學者能夠注意到明代開國諸戰中這場鄱陽湖戰役而加以詳述，算是難得。

從各種不同的舊籍記載看來，筆者初步認為發生在至正二十三年（西元一三六三年）的鄱陽湖之戰，並非朱、陳二人有計劃欲消滅對方的戰爭，它是朱、陳二人自至正十九年（西元一三五九年）直接衝突後，繼之而起的

一連串爭戰所引致的結果。說得更奇怪的是，該次耗時三十六天的生死決戰，雙方打的竟是有沒有預設戰場的戰爭。更有趣的是，朱元璋從頭到尾都沒有勝算的把握，無論就兵力上，戰場的位置上，或當時的局勢上而言，朱元璋都處於劣勢；反觀陳友諒從開始到中流矢而死的前一分鐘仍有不敗的信心和實力（陳軍兵力約三倍於朱軍），但結果卻朱勝陳敗。翌年，陳友諒逃回武昌巢穴的兒子陳理也向朱元璋投降，奠定了朱元璋統一天下的基礎，其中的曲折離奇，真教人意想不到。

本文欲透過分析鄱陽湖之戰的前因後果；當時朱、陳、張三人的爭霸情況；朱、陳的戰略、戰術等運用及客觀和主觀形勢之變化等因素，從而把鄱陽湖之戰的真實情況顯露出來，不以成敗論英雄，更不欲虛美朱元璋或貶斥陳友諒。當時民間起義抗元之士甚多，大都為平民百姓，但不久都各自稱王，如以白蓮教出身的韓山童自立為明王；以布販出身的徐壽輝則自稱皇帝，國號天完；以打漁出身的陳友諒亦建國稱漢；鹽梟出身的張士誠則自稱吳王；連赤貧之農家子弟朱元璋也自立為吳王；明玉珍則稱帝於四川，國號夏。各地稱王稱霸者不在少數，為了免生混淆，或對某人有預設立場之虞，本文論到各路英雄時，一律以本名稱呼，以示公平。因為就當時而論，元朝政權未覆，各人正逐鹿中原，蒼茫大地，一統江山者，未知誰屬，豈能以「太祖」，「漢王」或「吳王」等稱之。此外古今地名有異，本文亦儘量採用古名；年份和日期的計算亦以元順帝至正年號為記，附以陰曆，以便配合舊籍所載，免生誤差。

二、朱元璋的格局與實力

1. 抵定金陵後的形勢

朱元璋於至正十六年（西元一三五六年）攻下集慶（又名金陵，即今南京，朱元璋改為應天）後，才出現大規模擴充勢力之戰爭。事實上朱元璋不得不奮力打出生路，因為雖然佔據了以應天為中心的長江下游為根據地，但位於他東邊的張士誠，卻仍控制著徐、宿二州及運河兩岸如寶慶、淮安和高郵一帶，對朱元璋形成弧形包圍，而且地

盤較元璋大且富，領有蘇北、皖北及江南蘇、湖、杭等地，連朱元璋的安徽老家濠州也在士誠控制之中；在其西邊的陳友諒勢力更盛，以湖北的武漢為根據地，控有兩湖、江西全省及安徽部份地區，幅員廣闊，朱元璋更難望其項背。（請參閱附圖四）

在這種兩面受敵的情況下，朱元璋欲打出局面，必須逐一擊破。在衡量陳張二人的實力和心態後，朱元璋決意先與陳友諒角力，若能消滅地廣人多實力雄厚的陳友諒，奪取其資源，則張士誠便不難對付了。此時在朱元璋的北方，韓林兒（小明王）和毛貴的大軍正與元兵交戰，因此元璋暫時無北面之憂，加上劉基直言張士誠「守虜」而矣，不知進取，更加強朱元璋先對付陳友諒之決心。

2. 實力比較

朱元璋的戰略大方針雖然確定了——即暫時與元朝溝和，儘量對張士誠採圍堵政策，而主力則集中在西邊與陳友諒爭池奪地，打開自己的局面，擴大據點。若就實力而言，無論在幅員領地、人口和生產力等方面，朱元璋皆居陳、張二人之下風。陳友諒控制湖廣之區，地大物博，人口在一千四百萬之譜，經濟力自然雄厚，兵員充足；張士誠則據有漁米之鄉，江南富庶精華之區，民富而財力豐，人口也有一千萬；反觀朱元璋卻被夾在中間，無論交通、漕運、生產力等各方面皆不及陳、張二人，而且人口只有八百萬左右，（註四）無論財力、物力或人力皆居下風。

不過就人材資源而言，朱元璋擁有的文臣武將卻較陳張的來得優勝。在攻下金華之後，朱元璋禮賢下士，延攬了名儒劉基、宋濂和葉琛等作為謀士儒師，尤其得劉基時時獻計，朱元璋的整體發展策略才得以完備。加上早已追隨他左右的李善長、汪廣洋和一些後來陸續投效的儒生，使朱元璋的智慧團更為出色。例如朱元璋曾問如何才可以成就帝業，朱昇指出：「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三步驟。在朱元璋以後的逐鹿中原過程中，雖然也有自己的想法，但每遇危急時，還須處處諮詢他的謀士們。就這方面而言，陳友諒和張士誠皆不及朱元璋強。陳友諒自至正二十年（西元一三六〇年）殺害徐壽輝自立為帝後，能用的文臣謀士主要仍是壽輝時代的鄒普勝和張必先二人；張士誠在這方面的人材，更是乏善可陳。另一方面，陳友諒雖然兵員充足，猛將也不少，如張定邊（鄱陽湖之戰的主將）、趙普勝（原為巢湖水賊，勇猛有謀略，人稱雙刀趙）、傅友德、丁普郎和胡廷瑞等，但因友諒性猜忌，部將

未能赴死效命，尤其是在至正十九年友諒憤潛山之敗，又中了朱元璋的反間計，因而伏殺趙普勝，（註五）自毀一臂。反觀朱元璋自始至終猛將如雲，而且有一定的作戰班底，大將計有徐達、常遇春、朱文正（元璋姪）、鄧愈、廖永安、永忠兄弟及俞通海父子（四人原為巢湖水賊）等，將士一心，尤其是徐達和常遇春更合作無間，（註六）朱元璋可謂深得人和之道，部下大都同心效命，兵員雖然不多，但卻能將作戰力量發揮到極致。張士誠雖然亦有幾名勇將如呂珍等，但由於本人進取心不強，且於稱吳王之後，沉迷逸樂，少有凌厲的攻擊行動，多是趁虛騷擾朱元璋的後方，故暫時未能對朱元璋構成嚴重的威脅。不過，若論總體的作戰力而言，則以陳友諒最強，張士誠次之，朱元璋最弱，尤其是在至正二十年以前，即鄱陽湖之戰的前三年，朱元璋的水師最弱。（註七）

三、鄱陽湖大戰前之局勢

1. 陳友諒之野心

鄱陽湖大戰正式在至正二十三年（西元一三六三年）開打，前後只有三十六天左右，在這短短的一個多月的時間裡，竟然決定了朱勝陳敗的命運，說來也夠奇怪了。除非我們瞭解這次戰役並不是一場單一獨自發生的戰事，而是朱、陳二人自至正十九年到二十三年之間不斷爭戰下所引發出來的其中一場大戰役而已，否則我們便不能瞭解鄱陽湖之戰的真相。事實上，敵對雙方從未考慮過就此徹底解決對方，但由於客觀和主觀環境的改變，終於使朱元璋消滅了強大的陳友諒，也可說是中國水戰史上的奇蹟（雖說當年曹操大軍失敗於赤壁，但曹氏並未被孫、劉二人消滅，只是再難有南侵之力而已）。因此，若要瞭解鄱陽湖之戰，必須從至正二十年（西元一三六〇年）陳友諒奪取太平，弑殺壽輝自立為帝後，乘勝致書約張士誠夾攻應天之事講起，才能明白三年後鄱陽湖之戰的來龍去脈。

早在至正十九年，陳友諒與朱元璋爭奪池州、安慶失利。翌年潤五月，陳友諒繞道改攻太平，因為徐達和常遇春只知駐重兵守池州，未防友諒突襲太平，遂失守。陳友諒持勝生驕，未幾弑其主壽輝，並併其軍。此時友諒聲勢浩大，野心也增強，欲乘勝一舉消滅朱元璋，遂致書邀約張士誠夾攻應天，直撲朱元璋的巢穴。雖然張士誠對此邀

約不置可否，欲守境觀變，（註八）但陳友諒已蠢蠢欲動，急不及待獨自進攻應天了。

2. 朱元璋的抗禦

當陳友諒大軍南下的消息傳來時，應天震動，有主張出降的；有建議先退至鍾山以避敵鋒的；也有堅持與敵決戰的，意見莫衷一是。（註九）後劉基密議朱元璋宜以靜制動，以逸待勞，必能致勝。其戰略爲：不主動迎擊，但暗中派胡大海奪信州，斷友諒後路，再計誘友諒速攻應天，而以四週伏兵夾殺之。其中戰略有令李善長不解的地方，尤其是爲何要引誘敵人來犯，反而不出擊迎戰？就此問題，朱元璋與李善長有如下的精采對話——李善長問：「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朱元璋答說：「此策不可失，使二虜（即陳友諒和張士誠）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註一〇）可見劉基和朱元璋都算出自己當時的兵力實無力主動迎擊，且時日一久，更恐張士誠一旦改變主意決定夾攻應天，則不亡幾希。因此便爭取時間，在張士誠猶豫之際，務使友諒速來，以伏兵擊之。朱元璋命降將康茂才派一名曾在友諒軍中服務過的僕人往友諒營中，詐稱康茂才有意歸降，約其速來江東橋，以呼老康爲號，屆時裡應外合，定必攻陷應天。

3. 朱、陳之角力

朱元璋先命人改江東木橋爲鐵橋，以防陳友諒強渡，一方面又以舟師出龍江灣；再派張德勝於新河口築城，阻止友諒通過；常遇春與馮國勝則領三萬兵埋伏在石灰山附近；楊璟和徐達則分別伏兵於大勝港和南門外；朱元璋本人則親率大軍屯於盧龍山，（註一一）一切預備就緒，只待友諒中計入甕。（請參閱附圖一）

陳友諒收到詐降之書後，果然率十萬大軍順流而下進攻應天。當抵江東橋時，只見新造鐵橋，心覺不妙，連呼老康，沒人回應，警覺有詐，立刻退到北邊的龍江灣，萬人上岸立柵；不料伏兵湧出，突然前後夾攻，陳友諒大敗欲退，但水師多爲巨舟，且正值潮落，舟船大都膠淺，士兵被溺殺無數，生擒七千，元璋軍函獲友諒巨舟百餘艘，戰果輝煌。

當朱元璋考慮是否乘勝追擊時，正值李明道來降，告知元璋謂友諒自從殺害壽輝後，將士離心，政令不一，「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足用也。」（註一二）元璋遂決定追殺友諒。此時，池州守將張

志雄早已不滿友諒殺趙普勝，又見友諒龍灣之役大敗，遂向朱元璋投降。陳友諒見池州、太平皆失，急忙逃往江州，但朱元璋仍不放鬆追擊，在久攻安慶不下後，依劉基之議，改攻江州。當元璋兵過小孤時，友諒守將傅友德和丁普郎亦出降。朱軍勢如破竹，突然殺至江州，友諒大意未防，遂連夜帶著家小逃返武昌老巢。未幾江州及南昌沿岸的一些守將紛紛投降，尤其是江西省的胡廷瑞率眾獻南昌城投降影響至鉅。一時間，江西及湖廣部份地區皆為朱元璋所有，勢力日盛，也就種下日後鄱陽湖之戰的遠因。

四、決戰鄱陽湖

1. 陳友諒孤注一擲

朱元璋自攻下江州迫使友諒夜奔武昌後，便陸續接收了友諒在江西和湖廣的舊地，領土大增，勢力日盛；更命徐達扼守漢陽，隔江監視陳友諒，防其再出南下。但陳友諒也不甘示弱，自龍灣之敗，江州遁走以來，常思報復，遂日夜趕工建造巨艦樓船，招兵買馬，隨時準備南下收復失地。就在這段期間（至正二十二年），朱元璋控制的地區，局勢不穩。首先是在至正二十二年二月初，金華地區的苗兵發生動亂，苗將劉震、蔣英、李福三人同時反叛朱元璋，並擊殺行中書省參政胡大海及其兒子。數天後，處州的苗兵也叛殺守將耿再成，朱元璋趕忙派兵鎮壓，當浙江局勢剛靖平時，在江西方面的南昌又有亂事。

先是一年多以前，朱元璋敗走陳友諒後，胡廷瑞率部將祝宗、康泰等獻南昌歸降。不過，當時胡廷瑞卻有附帶條件，即希望自己原來率領的部曲，仍原封不動歸自己指揮，（註一三）這便做成至正二十二年三月祝宗、康泰二人的反叛。他們攻陷南昌城，殺害知府葉琛，（註一四）江西地區大為震動。朱元璋立刻命令屯兵漢陽的徐達率兵南下平亂，到了四月徐達才把亂事平息，但朱元璋卻不得不赦免康泰的罪，因為他是胡廷瑞的外甥，可見朱元璋對歸降的將士亦未能有效地控制，還要退讓三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十月，重要戰略要衝池州也發生叛變，守將羅友賢反叛朱元璋，密謀與張士誠通好，最後被常遇春平定。

這一切的變化，陳友諒都看在眼裡。江西省沿岸守將軍心浮動，局勢不穩。只待時機成熟，定必大舉南下，收復失地，陳友諒內心一直這樣盤算著。機會終於來了，至正二十三年正月，張士誠將呂珍領兵圍攻安豐，欲攻殺城內的韓林兒（即小明王）和劉福通等人。安豐守軍堅拒月餘，漸感不支，遂向應天的朱元璋求救（此時的朱元璋名義上仍奉小明王為主）。朱元璋欲親往營救，但劉基反對此行，理由是：「可借刀殺小明王，而且又恐陳友諒乘空而攻應天。」（註一五）但元璋卻自有打算，這次並未聽從劉基的意見，決定親往營救。他所持的理由主要有兩點：首先是政治上的考量——「（太祖）所以拒劉基之諫，而赴安豐之急者，為小明王在焉故也。」（註一六）因為既奉小明王為主，理應往救，「既可縮小自己的目標，減少打擊，又可利用小明王的影響力爭取群眾」（註一七）其次是軍事上的考量，安豐是應天北面的屏障，一旦陷入張士誠之手，應天危殆，故不能不救。事實上朱元璋把小明王救出來之後，雖設宮對其供奉甚優，但宮中宦侍全換上元璋的親信，實際上把小明王置於自己監視之下，（註一八）達到一舉兩得的目的——既保住安豐，又能以小明王為號召。

就趁朱元璋營救安豐之時，陳友諒果如劉基所料，率領六十萬大軍南下。不過，友諒並非直撲應天，而是出人意表地突襲南昌。當時沒有人料想到陳友諒會攻擊南昌，因而守城士卒不過七千。由於圍攻南昌，而引發朱、陳一決生死的鄱陽湖大戰，實朱陳二人始料不及的結果。

此次的決戰，實在是南昌城圍攻戰的後續。假如陳友諒不攻南昌，則不可能發生鄱陽湖大戰，而日後統一天下者，亦屬未知之數。前人評論陳友諒以大軍攻南昌是犯了兵家大忌，幾乎一致認為此乃朱勝陳敗的關鍵，咸指出若以大軍直攻應天，則戰敗者很可能是朱元璋。首先提出這種看法的就是朱元璋本人。他在鄱陽湖之役戰勝後，對劉基說：

「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出，建康（即應天）空虛，順流而下，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註一九）

後人對此戰役勝敗之看法，大都同意朱元璋的評論。其實不然，筆者認為陳友諒攻南昌而不攻應天，自有他的作戰

謀略，不過最後由於發生了那一場沒有預想到的鄱陽湖大戰，加上天時地利皆不順遂，陳友諒致有失算。但他空國而來，大軍直攻南昌的戰略是合情合理的，且是上策，非如元璋所稱的「計之下者也。」

「陳友諒忿其疆土日蹙，乃作大艦來攻，艦高數丈，外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艚舟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艚箱（即弓箭手之塔樓）皆裹以鐵，自爲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註二〇）

這是敵方（朱元璋）的記載，字裡行間可見陳友諒兵威之盛，決心之強，信心之足。可惜其中只提到友諒大軍南攻的一個原因而已——即忿疆土日蹙。其他原因，尤其是不攻應天而攻南昌的道理何在，舊籍記載一概不提。不過，綜觀當時的局勢而言，陳友諒攻南昌是明智而穩健的策略，其所持的理由至少有三點：首先誠如《太祖實錄》所記「忿疆土日蹙」是主要原因。由於朱元璋在前兩年取下江州，致使南昌及沿岸的不少據點皆爲其所有，勢力向西北發展，直接威脅陳友諒的武昌巢穴，（註二一）友諒爲了挽救在長江中游的頹勢，欲先攻佔南昌，作爲交通、軍事、政治的中心，從而恢復江西及其南部各縣區的控制權，事實上這是十分正確的戰略。早在徐達平定祝宗、康泰之叛，收復南昌後，朱元璋便沾沾自喜說：「南昌重鎮，西南之藩屏，吾得南昌，去陳氏一臂矣。」（註二二）可見南昌地位的重要性。陳友諒若取下南昌，則退可守，進可攻，隨時可直接撲應天，使朱元璋如芒在背，枕食難安。其次是南昌沿岸局勢不穩，先降後叛元璋者此起彼落。陳友諒衡量形勢，認爲若果能夠收復南昌的話，「便可望江西各地的守將會回心轉意，重回到他的麾下。」（註二三）第三個原因很可能是南昌距離武昌較近，順流而下，約三幾天的路程，且守城士兵不多，較取應天來得容易。

至於友諒不攻應天的理由，也有其考量的原因。鑑於前次攻應天時，在龍灣一役遇伏兵大敗，因而這次友諒的作戰方略也改以大軍突襲兵少的南昌，希望控制江西及湖廣後，能夠隨時直撲應天。另一方面，雖然朱元璋往救安豐，常遇春和徐達也正在圍攻左君弼於廬州，但若應天告急，他們回師也速，屆時朱元璋定必決意死戰以保根基，自己縱然得勝，也會傷亡慘重，如果再中伏兵，豈不自招滅亡？友諒爲穩健計，以大軍直取南昌應爲上策；再加上

估計張士誠若得悉南昌城破，很可能乘機進攻應天，以報呂珍失安豐之仇，果若是，則可聯手張士誠夾攻朱元璋，必陷應天。這是陳友諒的戰略，消滅朱元璋並不急於一時。事後在鄱陽湖大戰方殷時，朱元璋果然憂慮張士誠攻應天，命徐達速回後方，保衛應天，（註二四）證明陳友諒的沙盤推算確實有理。

兵凶戰危，敵對雙方勝敗的原因十分複雜，未到戰事結束，誰也不敢肯定誰會勝出。不過，就戰略戰術而言，陳友諒這次領六十萬大軍乘巨艦空國而來，直撲南昌，當然自付有勝算把握；反觀朱元璋只率領二十萬士卒，乘坐小舟戰船來救被圍的南昌，心裡七上八下，面有懼色。（註二五）可見雙方實力懸殊。

陳友諒早在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已派驍將張定邊攻取饒州，以為探路。待元璋三月往救安豐時，便於四月親率大軍空國南下，直撲南昌，江西震動。當時都督朱文正（元璋姪）與參政鄧愈統率全城士兵誓死守城，並緊急部署各主要城門入口——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守官步、土步、橋步三門；指揮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程國勝等守琉璃、澹台二門；朱文正則「居中節制」。（註二六）（請參閱附圖二）

由於陳友諒在至正二十年攻太平及早期陷南昌城時，皆以巨舟高聳的尾部攀槓而陷城。因此，朱元璋在收復太平和南昌後，皆將城牆內移以利防守——「初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為陳友諒舟師所陷，至是常遇春移築，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置樓堞，守禦遂完。」，（註二七）「洪都（即南昌）始瞰大江，友諒前攻城，以大艦乘水漲附城而登，故為所破。上既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註二八）朱元璋這種防禦工事果然使陳友諒的巨型戰艦失去攻城的作用。但陳友諒仍有第二套作戰計劃，他首先進攻撫州門，破壞城牆二十餘丈，欲強行進入，卻被鄧愈等以火銃擊退，但李繼先和牛海龍皆戰死。陳友諒見攻不下南昌，遂改變戰略，命蔣必勝、饒鼎臣（人稱饒大膽）攻吉安，此外再派兵攻取臨江和無為二地，奪取江西重要據點，以壯聲威，並希望沿江守將再叛朱元璋，回歸自己麾下。

果然，當五月份蔣、饒攻吉安時，原本早已歸降朱元璋的李明道，此時正與曾萬中兄弟不和，遂暗中約蔣必勝來攻，開門納之，因而城陷。（註二九）事實上，早在至正二十三年四月，陳友諒攻南昌時，諸全守將謝再興因不滿朱元璋削其職，遂叛元璋，投奔張士誠。這種局勢的變化對陳友諒相當有利。因此，在攻佔吉安、無為等地後，

陳友諒再強攻南昌的新城門，惜被薛顯擊退；但友諒不服，更集中兵力欲攻進水關，破柵而入，但又被朱文正打退。這段激烈的攻防戰，《太祖實錄》有如下的精采記錄：

「都督朱文正使壯士以長槩從柵內刺之，敵奪槩更進，文正乃命火燬鐵戟鐵鉤穿柵更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註三〇）

攻防雙方你來我往，盡一切能事希望打敗對方。此時，陳友諒無計可施，只有作最後一擊，全力強攻宮步、士步二門，但守城將士皆奮勇抵抗，趙德勝中流矢身亡，但友諒軍始終未能破城。此時朱文正亦已發覺南昌城不能再支持多久了，遂派張子明潛出，往應天告急。張子明晝伏夜行，經半月餘才抵應天。朱元璋震驚，著令張子明回報南昌務必再堅守一個月，救兵必至。當子明潛返南昌時，被陳友諒捕獲。子明詐降，並偽稱可代友諒勸降朱文正。當他被帶到南昌城下見朱文正時，卻大呼救兵將至，務必堅守一月，切勿投降。友諒大怒，立刻將子明處斬。陳友諒見久攻不下，遂下令圍城，欲以糧絕迫朱文正投降，但文正等誓死抵抗，以待元璋救兵。

2. 朱、陳會戰康郎山

朱元璋得知南昌告急後，立刻命令正在圍困廬州左君弼的徐達和常遇春回師應天，馬上整軍往救南昌。至正二十三年七月，朱元璋為統領，徐、常二將為其左右，率領二十萬大軍溯江而上往救南昌。當水師泊於湖口時，朱元璋仍運用他一向的作戰技術，先行伏兵佈署重要據點：首先派戴德守涇江口，再派另一軍屯南湖嘴，以斷陳友諒的歸路，又調兵扼守武陽渡，防止友諒奔逸。（註三一）此時南昌已被圍攻八十五日了。陳友諒得知朱元璋大軍至，遂自動解圍，率師迎戰。兩軍終於在鄱陽湖南端的康郎山附近相遇，爆發決定朱陳二人命運的水上大戰。

這次鄱陽湖大戰的主要戰場是在湖面上，而湖面的地形及周遭環境的地勢也是影響勝敗的關鍵，瞭解整個戰場的地形，才能明白朱元璋終能以寡勝眾的原因。鄱陽湖北邊窄南邊闊，贛江由南至北縱貫江西省的中央，並會合其他水道注入湖水，湖中大小州渚星羅棋佈，湖水亦深淺不一。湖的北面有大孤山，扼住湖口，形勢險要；南面有康郎山，附近大小州渚浮出湖面；東北端為澎澤，其北約十里處有小孤山，與大孤山遙遙相對，是江與湖的交通咽喉。

喉；南康東邊的嬰子口乃湖身收窄之處，是由湖入江之要道。（註三二）（請參閱附圖三）

單就這次戰場的地形來看，對陳友諒的巨艦樓船實在不利。友諒軍人數號稱六十萬，縱然誇大，也有三、四十萬之譜，再加上朱元璋的二十萬大軍，總計至少有五、六十萬人在這個不利巨舟運行的湖面及水道上大戰，實可想像戰況有多麼激烈。朱元璋的戰船雖然體積小，但較適合在狹窄及水淺的湖面作戰，佔盡地利；加上配備大小不同的火炮，火箭，對付陳友諒的巨艦，有利於火攻。朱元璋傾一切力量帶著凌厲的武器，計有：

「火炮、火銃、火箭、火蒺藜、大小火鎗、大小將軍筒、大小鐵砲、神機箭以及蘆蓆作圈圍五尺，長七尺，糊以布紙絲麻纏之，內貯火藥引子及諸火器，名曰：沒奈何，用竿挑頭桅之上，兩船相幫，燃火線，刀斷懸索，沒奈何落於敵船中，火器俱發焚毀無救。」（註三三）

這次朱、陳二人在鄱陽湖南端康郎山的遭遇戰前後共計三十六天，水面戰況之激烈，實中國歷史上罕見。綜觀古籍的記載，得知當時實際的戰況，並可反映雙方的實力。兩軍剛接仗時，朱元璋見友諒樓船巨艦列開首尾連接的陣勢，認為巨舟不利進退，遂下令攻擊三步驟——先發火器，次為弓弩，待接近敵船時，則以短兵擊之。但事實證明此乃戰術的理論而已，不切實際，因為陳友諒的戰船既高且大，朱元璋的小舟只能仰攻，根本不能接近對方的水師。站在遠處用火器攻之，猶能發揮一些作用，短兵實無法攻擊對方。因此，徐達、常遇春和廖永忠都只能以快舟衝殺一輪便退，愈通海則以火炮焚敵船二十艘，但卻波及徐達的坐舟。

友諒將張定邊也不甘示弱，立刻反攻，直撲朱元璋的坐舟，迫其擱淺，並將元璋團團圍住，全力攻擊。元璋勇將韓成、程國勝、及元帥宋貴和陳兆先等皆戰死。正在危急關頭之時，常遇春及時趕至，「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卻。」（註三四）但遇春舟和元璋舟卻一起擱淺；此時愈通海領舟隊救元璋，「舟驟進水湧，太祖脫險。」（註三五）元璋可謂死裡逃生。雙方繼續你來我往，互有勝負，戰至黃昏，各自暫時收兵稍歇。元璋在重整軍容之後，命徐達回師守應天，以防張士誠趁虛突襲自己的根基。

當第二回合再戰時，陳友諒改變戰陣，使朱元璋處於劣勢。「友諒率巨舟，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

我舟小，仰攻多卻，太祖親麾之，不前，右師少卻，立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爲非火攻不可。」（註三六）朱元璋無計可施，終於同意元帥郭興之議，在己方「連戰三日，幾殆」（註三七）的情況下，實施火攻。於是立刻下令改裝七艘漁船爲火船，束草爲人，偽裝成甲冑之士，待命而發。適巧黃昏時份突起東北風，火船直衝友諒水師，火乘風勢，處於元璋軍西南方的友諒樓船紛紛著火焚燒，傷亡慘重，最使友諒氣喪的是，他的兩位弟弟友仁和友貴亦被焚斃，尤其是人稱「五王」的陳友仁更是驍勇之將，友諒遂失得力助手。至此，朱元璋暫時把友諒凌厲的攻勢壓下來。

雖然陳友諒在被火攻之後損兵折將，但實力仍強，且再次集中兵力直攻朱元璋的坐舟，「（太祖）復率衆大戰，自辰至巳不解，時劉基侍，忽躍起大呼，太祖亦躍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曰：難星過，急更舟！太祖如言，入他舟，坐未定，舊所御舟以砲碎矣。」（註三八）元璋幸好及時走避，否則便一命嗚呼了。

此時廖永忠和俞通海實行深入殺敵，領六舟衝入友諒陣中，戰至午時，友諒不敵，欲退往保鞋山以作稍息，但朱元璋早已在附近的墾子口埋有伏兵，友諒不得出，遂「斂舟自守」，暫時停戰；朱元璋方面也趁機稍歇，移師停泊於柴棚，與友諒軍相隔只有五里。此時元璋「諸將以漢軍（即陳友諒軍）尙強，欲縱之去，遇春獨無言。」（註三九）可見經火攻後，友諒軍勢仍盛。元璋諸將大抵認爲再戰亦未有勝算把握，不如趁友諒斂舟自守時，退師回朝，就此打住，也總算小勝。因爲本來出師的目的在營救南昌，而今南昌城早已解圍，（註四〇）理應收手，否則未知勝敗誰屬。

《太祖實錄》記載此段事實時，有意淡化元璋軍懼怕友諒兵強的心理，而稱「（太祖）數遣人往挑戰，敵不敢應，諸將議欲退師，少休士卒。」（註四一）所謂「少休士卒」，即退師不欲再戰之意，不過在遣詞用字中，不使人感覺難堪而已。但朱元璋反對退師，認爲雙方正在交戰，若先行退縮，定必惹敵追殺，到時軍心散渙，後果不堪設想；但若要主動攻擊友諒，將士皆不太願意，正苦於進退兩難之際，熟悉湖面變化的俞通海認爲，根據季節日子的推算，湖水將會愈來愈淺，提議移出舟師扼住長江的上游，元璋軍於是乘夜駛出鄱陽湖，停泊於左蠡。友諒軍也趁機移出，泊於渚磯，雙方又再對峙三天，不敢交鋒。

在此期間，友諒陣營又起變化。他的左右金吾將軍所提的作戰建議剛好相反。左金吾將軍說：「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尙堪一戰，若能僥倖，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舟）以示弱？」（註四二）左金吾有此語，是反對右金吾焚舟改以陸路北還之建議而來的，可見此時友諒軍仍有實力再戰。陳友諒雖然同意右金吾的意見，但未見諸行動。左金吾見受嫌，遂投奔朱元璋；右金吾察覺情況不妙，也投往元璋陣營去了。陳友諒自失兩金吾將軍後，情勢頓轉不利。此時朱元璋實行心理戰，致書友諒，激其再戰。友諒性格本就「忿激躁切」，一怒之下，盡殺擒來的戰俘，並率兵巡視水寨，準備與朱元璋決戰。相反地，朱元璋不但不殺戰俘，反而釋放他們——「（太祖）悉所出俘友諒軍，視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返，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註四三）

朱元璋這種心理戰相當成功，一方面使友諒軍心散渙，另一方面，自己的士兵定必奮勇作戰，因為得知若一旦被友諒擒獲，必死無疑，所以寧願戰死，不願就擒。此時朱元璋的水師已移出湖口，並加強軍事部署。常遇春伏兵橫截湖面，以斷友諒歸路；元璋又命一軍立柵於岸，控扼湖口，把友諒困住，雙方又對峙十五日之久。陳友諒此時糧食不繼，遂派兵搶掠都昌，但朱文正使人焚其舟，友諒不得逞。最後決定突圍逃返武昌，以圖後計。但朱元璋的水陸大軍早已埋伏在江之南北兩岸，預置火舟、火筏於中上游，嚴陣以待。

果然，陳友諒率樓船欲從南湖嘴出，但被元璋軍退阻，不過陳軍仍「（冒死）突湖口，常遇春等以火舟火筏追擊之，聯比沿流，自辰及酉，力戰不休，至涇江口，伏師復出擊之，友諒目中流矢貫顙卒。」（註四四）張定邊帶著友諒的屍體及其子陳理漏夜潛返武昌，友諒軍至此大潰，朱勝陳敗之局已篤定，歷時三十六天的鄱陽湖之戰也告結束。

3. 朱、陳的實力及戰略分析

由於陳友諒傾國而來進攻南昌而引發鄱陽湖之戰，若論實力，友諒軍號稱六十萬，是朱元璋軍隊的三倍，聲勢甚是嚇人，無怪乎連朱元璋在開戰前也感到不安，要劉基爲他看看氣色如何。劉基也無必勝把握，只好用「天命有歸，仁義之師必勝」一類說話來安慰朱元璋。不過，除了表面的兵員數目外，朱、陳雙方的其他實力不相伯仲。雖然朱元璋的戰船體積小，甚至只能仰攻敵船，但在狹窄而多州堵的湖面上作戰，反而佔有地利，行動靈活自如，機

動作戰能力強；反觀友諒的巨舟戰船，雖然樓櫓如山，每艘可載士兵二、三千人，但由於湖面水淺州渚多，實不利運行，在地利上反而吃虧。

另一方面，朱元璋的將士不僅個個效命，且是百戰猛將，如徐達、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皆熟習水戰；但友諒方面猛將卻不多，主要靠張定邊，加上將士上下離心，作戰態度隨時有變，故有左右金吾投奔元璋陣營。此外，朱元璋有厲害的謀士團，如劉基、李善長隨時獻計，處處得著先機。但友諒卻剛迫自用，對於部下之建議大都充耳不聞，常常自己一人決定作戰方略，故有計窮之時。再其次就是補給的問題，友諒早已空國而來，武昌基地後勤力量不強，加上元璋埋下伏兵先斷其後路，友諒在毫無補給之下，致有糧盡之危。但朱元璋則命徐達返回應天，加上南昌亦已解圍，補給可源源而至，無後顧之憂。若論雙方總體的實力，朱元璋以質取勝，陳友諒以量爲優。

戰爭的勝敗往往並非完全取決於表面的實力，而要靠主帥運用戰略、戰術得當與否而定。無可否認，朱元璋最擅長以寡擊衆，以逸待勞的戰術。他的策略離不開熟悉地形，以各縱隊分別預伏要衝之地，以斷敵人後路，孤立對方，然後再出擊等方法，早在龍灣之役大敗陳友諒時已顯出其效果。此外，朱元璋又注重防禦工事，在戰爭前便已作好準備，例如把南昌城牆移入三十步，遠離江邊，使陳友諒的巨舟不能攀堞而上。另一方面，朱元璋亦懂得使用心理戰，在大戰方殷兩軍對峙時，曾先後兩次致書友諒，激其出戰，致使友諒忿而盡殺戰俘，顯露殘暴的一面；但朱元璋卻能善待戰俘，並全數釋放之，爭取了敵人的好感，這種心理戰術，甚爲奏效。朱元璋作戰時的大策略是，可進則進，須退則退，充份表現出隨機應變的作法，例如他在往救南昌途中遭遇友諒軍於康郎山時，亦從未打算就此消滅陳友諒，而一心只希望能夠打退友諒，替南昌解圍而已，若勝則視情形而定，或攻或止；敗則退守應天，故須埋伏兵以阻友諒之追兵。（註四五）但當戰爭打下去後，天時、地利、人和皆幫助了朱元璋。無怪乎在消滅陳友諒後，朱元璋自鳴得意地對部下說：

「汝不聞古人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強，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用兵連年，數敗而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勞於東，明日又馳驚於西，失衆心也。夫兵貴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

師，威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此所以爲吾所破也。」（註四六）

在陳友諒方面而言，他在戰略、戰術上也有一定的謀略。友諒善以大壓小，以衆擊寡，而且最喜一鼓作氣，直攻敵人要害。可能由於性格使然，陳友諒往往傾巢而出，不爲自己退路打算，儼然有十足勝算把握。在至正二十三年攻南昌時，友諒則早已瞭解當時江西不穩之局勢情況，對自己有利，作了沙盤推演，故不攻應天而攻南昌，實是穩健而明智之舉。且在同年二月，又遣先行部隊攻陷饒州。再等到四月春汎江水暴漲時，才率大軍順流南下進攻南昌。（註四七）不出三幾天，大軍已抵達南昌城下。陳友諒事先估計，以數十萬之兵攻城，城必陷，基本上他仍沿用巨舟攀堞之戰術。可惜這次友諒的情報不準，竟未悉南昌城牆早已矩江移入三十步，再加上朱文正等誓死抵抗，大軍被拖滯達三個月之久，使朱元璋有充裕的時間領兵往救，而最後發生康郎山遭遇戰。

陳友諒在鄱陽湖大戰的主要策略是「射人先射馬」。開戰不久，張定邊便率舟兵直攻朱元璋坐船，務要擊殺之，朱元璋當時的處境實在危險，可幸常遇春和俞通海及時搶救成功，否則元璋性命不保。第二次也是衝著元璋舟而來，幸劉基警覺性高，與元璋急忙換舟，才不致被擊斃。本來陳友諒圍南昌不下後，與朱元璋交鋒的策略是，可戰則戰，落敗則逃。不料被拖三個月，時節已過，而到了夏季末。江水水位開始低落，不利巨舟運行，友諒頓感失算。雖然如此，但與朱元璋發生遭遇戰時，仍能佔據上風，但莫名其妙來了一場東北風（在夏季的鄱陽湖區應該吹東南、或西南風），位於元璋軍西南位置的陳友諒正好被對方用火舟攻擊，致有傷亡慘重。不過，友諒軍事後實力仍強，而朱元璋也未能一舉滅之，反而要暫打退堂鼓，移師離開鄱陽湖面，一方面稍事休歇，一方面據扼上游，伏兵要衝，欲將友諒困在鄱陽湖內而迫降，可見元璋軍本身損耗也不少。

雙方在對峙十多天之後，陳友諒決定突圍，於是冒死衝出湖口，但被預伏四週的元璋軍以火舟、火筏值西風之助順流攻擊，遂退至涇江口，「（友諒舟師）拋五鐵錨，始住，兩軍相望二十餘里，（元璋）兵皆倒身搖櫓，又值西風順水，船下如箭，比至紅船（友諒舟師皆漆紅色），三百步間，箭筒、將軍筒、標叉又俱發如雨，紅船將士，無所躲避。」（註四八）但友諒仍能與元璋大戰十個小時，殺得難分難解（自辰至酉，大戰不休），足見友諒此時

雖然處於劣勢，但仍有一線生機，可是陳友諒此時「啓窗顧視，宣武遽射之，矢貫其顙及睛而死。」（註四九）這才真正結束了朱勝陳亡的鄱陽湖大戰。

五、結 論

鄱陽湖一戰確定了數年後朱元璋統一天下，創建明帝國的結果。原本強大的陳友諒，卻在這場沒有預設的決戰中，落得喪身覆國的命運，真教人感到有點意外。陳友諒雖然是漁家子出身，但自從計殺倪文俊後，便充滿野心；弑壽輝稱帝後，更有一統天下的企圖，實是群雄中最剽悍，最具實力的人，谷應泰曾對陳友諒有如下的批評：

「慨自元人失馭，群雄蜂發，逐鹿之夫，所在皆有，……然皆闔門坐大，非有圖天下之志也。獨陳友諒以梟了之姿，奄有江楚，控扼上游，地險而兵強，才剽而勢盛。」（註五〇）高岱亦慨嘆曰：

「友諒之勇悍雄略，雖或未及項羽，而剽迅飄忽，大困而氣不餒，屢蹙而勢復振。觀其龍江敗歸，還襲安慶；九江之失，疾奔武昌。及徐達召返，不旋踵而有江州之入，是以敗衄之餘，旬日之間，而能陷城卻敵，蓋深通兵法，不阻不撓，故能開拓封疆，奄有荆楚，亦一世之雄也。」（註五一）

友諒與項羽命運相似，都是在與敵人決戰中喪命，所不同的是，友諒不幸中流矢而死，項羽則無顏面見江東父老，而自殺身亡。本來二人皆可以死裡逃生，他日隨圖後計，惜前者運氣不佳，中箭身亡；後者則性情剛烈，一死以謝左右，而使敵人最後稱霸天下。吳晗於此曾一語道破朱勝陳敗的關鍵所在：「（鄱陽湖）戰事之勝利，取決於最後一分鐘，造成陳軍潰敗的是陳友諒的戰死，元璋雖然勝利，可是也險極了。」（註五二）當然，主帥戰死是造成潰敗的主因，但兵凶戰危，矢石亂飛，誰能保證在這三十六天的決戰中，朱元璋不會中流矢身亡，那時很可能變成陳勝朱敗的結局，日後統一天下者或許就是陳友諒了。當然，主帥的突然陣亡，誰也不能預測。

但是，就實際的戰略、戰術和兵力方面而言，朱、陳兩方的主帥都可以運用經驗和智慧來達到最高的作戰效

率，希望能把對方打敗，這又涉及主觀和客觀兩種環境的配合情況，而最能掌握的是主觀環境。

陳友諒戰敗的主要關鍵，除了上述無可預測的「天意」中流矢而死外，在主觀的作戰策略上，筆者認為陳友諒犯了一個最嚴重的兵家大忌，那就是忘記了兵貴神速，分頭伏擊的戰略。陳友諒一向持兵強而態驕，作戰時顯得非常急躁，且求勝心切，早在至正二十年便中康茂才詐降之計，被誘速攻應天，（註五三）致有中伏，慘敗於龍江灣。這次領六十萬大軍，以泰山壓頂之勢直攻南昌，認為不出數天便可破城，但卻被七千守城將士拖滯了三個月之久。友諒最失策的就是在久攻南昌不下時，沒有分兵先斷朱元璋可能從應天出兵往救之路，或扼守鄱陽湖區與長江水道之要衝，斷絕南昌與應天之間的呼應。以當時陳友諒的強大兵力而言，分兵預伏要衝之地，絕無問題。奇怪的是，陳友諒愈是攻不下南昌，心裡愈是憤恨，也就更集中兵力圍攻之，曠日彌久，使朱元璋有充份時間派兵往救，並預設伏兵，以斷友諒歸路。這是陳友諒可用而不用之基本戰略，其招致敗亡，實有主觀的道理。

另一方面，由於陳友諒性好猜忌，至正十九年便憤殺得力勇將趙普勝，友諒軍雖強，但上下早已離心，加上脾氣暴躁，被朱元璋兩次致函刺激之後，竟將所擒戰俘全部殺盡，大失人心。反觀朱元璋卻善待戰俘並悉數放回，在心理宣傳戰上，元璋取得重大勝利。此外，朱元璋擅長使用靈活應變及分兵伏擊的戰略，加上將士效命，上下一心，兵雖少，卻能發揮最大的作戰能力，這些都是朱元璋在主觀環境上勝過陳友諒的地方。

最後陳友諒在客觀環境中失利，更是潰敗的原因。陳友諒也懂觀察天時地利，他首先衡量清楚至正二十年後的江西和浙江的局勢，然後趁朱元璋往救安豐時，突襲兵力弱小的南昌城，而且不是在元璋三月離開應天時即出兵，而是等到四月春末夏初，江水暴漲時順流南下，直撲南昌城，實行速戰速決，圖一舉破之，控制江西之後，隨時直迫應天，可謂明智之舉，怎能說「友諒不攻應天而圍南昌乃下下之策」呢？

可惜客觀環境有變，誰也料不到在鄱陽湖開戰之初，友諒正處於優勢時，竟突然來一場東北風，使原位於下游，情況不利的朱元璋得以施用火攻，友諒因而傷亡慘重。戰到後期時，朱、陳雙方對陣的位置互調，朱軍此時扼上游，陳軍則位於下游，在元璋之東。結果西風大起，朱軍又得以火舟，火筏趁著風勢順流而下，衝攻陳軍。陳友諒乃且戰且退，來到涇江口，總算有一線生機突圍北返，但當伸首窗外視察戰況時，竟中流矢而死，朱、陳二人最

後的勝敗亦因而決定了。

元末天下大亂，舉世滔滔，群雄逐鹿中原，欲一統江山者，比比皆是，初期勢盛者未必最後成功，如韓林兒、劉福通、徐壽輝等；中途一路領先者如陳友諒、張士誠等也難料結局；勢孤力弱者如朱元璋，是否能夠後來居上，當時亦無人料到。成王敗寇，史書所記大都為得勝者褒揚，鮮為落敗者道出真貌。綜觀鄱陽湖之戰，可知天命之無常，勝敗未決之前，誰也不能斷言。

註釋

註一：吳晗，《朱元璋大傳》，台北：遠流出版社，民國八十年八月，頁九九。

註二：牟復禮編，張書生、黃沫等譯，《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二月，頁九〇。

註三：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台北：三民書局，民國五十八年，頁三二。

註四：Edward L. Dreyer, "The Poyang Campaign, 1363: Inland Naval Warfare in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ed. Frank A. Kierman, Jr., & John K. Fairbank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台北：虹橋，民國六十四年五月版），p. 203。

註五：方覺慧，《明太祖革命武功記》，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三年四月，頁一三〇。

註六：魏汝霖，《中國歷代名將及其用兵思想》，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印，民國七十年六月，頁四〇六。

註七：Dreyer, "The Poyang Campaign, 1363", p. 204.

註八：徐乾學，《張士誠本傳》，見《明史列傳》，台北：學生書局，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頁四一。

註九：王崇武，《明本紀校注》，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七月，頁七五。

註一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實錄一，太祖實錄》，卷八，頁〇一〇三。

註一一：楊家駱主編，《新本明史并附編六種（一）》，卷一，本紀第一，台北：鼎文書局，民國六十四年六月，頁八。

註一二：《太祖實錄》，卷九，頁〇一二七。

註一三：同前書，卷九，頁〇一二三。

註一四：夏燮，〈明通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十月，頁二三。

註一五：〈朱元璋大傳〉，頁九八。

註一六：潘樾章，〈國史考異〉，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七年三月，頁六五。

註一七：顧俊，〈明朝史話〉，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七月，頁一三。

註一八：同前書，頁一四。

註一九：〈明史紀事本末〉，同註三。

註二〇：〈太祖實錄〉，卷十二，頁〇二五一。

註二一：中國歷代戰爭編纂委員會，〈中國歷代戰爭史〉，第十四冊，台北：黎明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三月，頁五一。

註二二：高岱，〈鴻猶錄〉，台北：新興書局（據明萬曆丁巳年刻本影印出版），民國六十六年八月，頁七五六。

註二三：〈劍橋中國明代史〉，頁九二。

註二四：〈徐達傳〉，〈明史列傳〉，頁一〇〇。

註二五：錢謙益，〈國朝群雄事略〉，收入王有立主編〈中華文史叢書（第二輯）〉內，台北：文華書局，民國五十八年六月，頁二〇〇。

註二六：〈太祖實錄〉，卷十二，同註二〇。

註二七：〈明通鑑〉，前編卷二，頁二一。

註二八：同註二〇。

註二九：〈太祖實錄〉，卷十二，頁〇二五三。

註三〇：同前書，卷十二，頁〇一五五。

註三一：同前書，卷十二，頁〇一五七。

註三二：〈中國歷代戰爭史〉，第十四冊，頁四八。

註三三：〈國朝群雄事略〉，頁二〇一。

註三四：〈太祖實錄〉，卷十二，頁〇一五八。

註三五：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十），〈明列傳第二十一，俞通海傳〉，台北：明文書局，民國八十年，頁三八七六。

註三六：《明史紀事本末》，頁二九。

註三七：《新本明史并附編六種（一）》，列傳十一，卷一二三，〈陳友諒傳〉，頁三六八九。

註三八：《明史紀事本末》，頁三〇。

註三九：《新本明史并附編六種（一）》，卷一二五，〈常遇春傳〉，頁三七三四。

註四〇：《劍橋中國明代史》，頁九五。

註四一：《太祖實錄》，卷十二，頁〇一六一。

註四二：同上註。

註四三：《太祖實錄》，卷十二，頁〇一六二—三。

註四四：談遷，《國權》，卷一，台北：鼎文書局，民國六十七年七月，頁三〇五。

註四五：Dreyer, "The Poyang Campaign, 1363", p. 219.

註四六：《太祖實錄》，卷十三，頁〇一七一。

註四七：過庭訓，《本（明）朝分省人物考》第四冊，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國六十年一月，頁二二四七。

註四八：《國朝群雄事略》，頁二〇四—五。

註四九：劉辰，《國朝典故》，〈野記卷一〉，台北：新興書局，民國七十四年五月，頁二五六。野記載射死陳友諒者乃郭宣武（即提議用火攻友諒舟師的郭興），撰者祝允明未載明所據何典。《太祖實錄》、《明史》和《明史紀事本末》等皆謂陳友諒中流矢死，未指明何人射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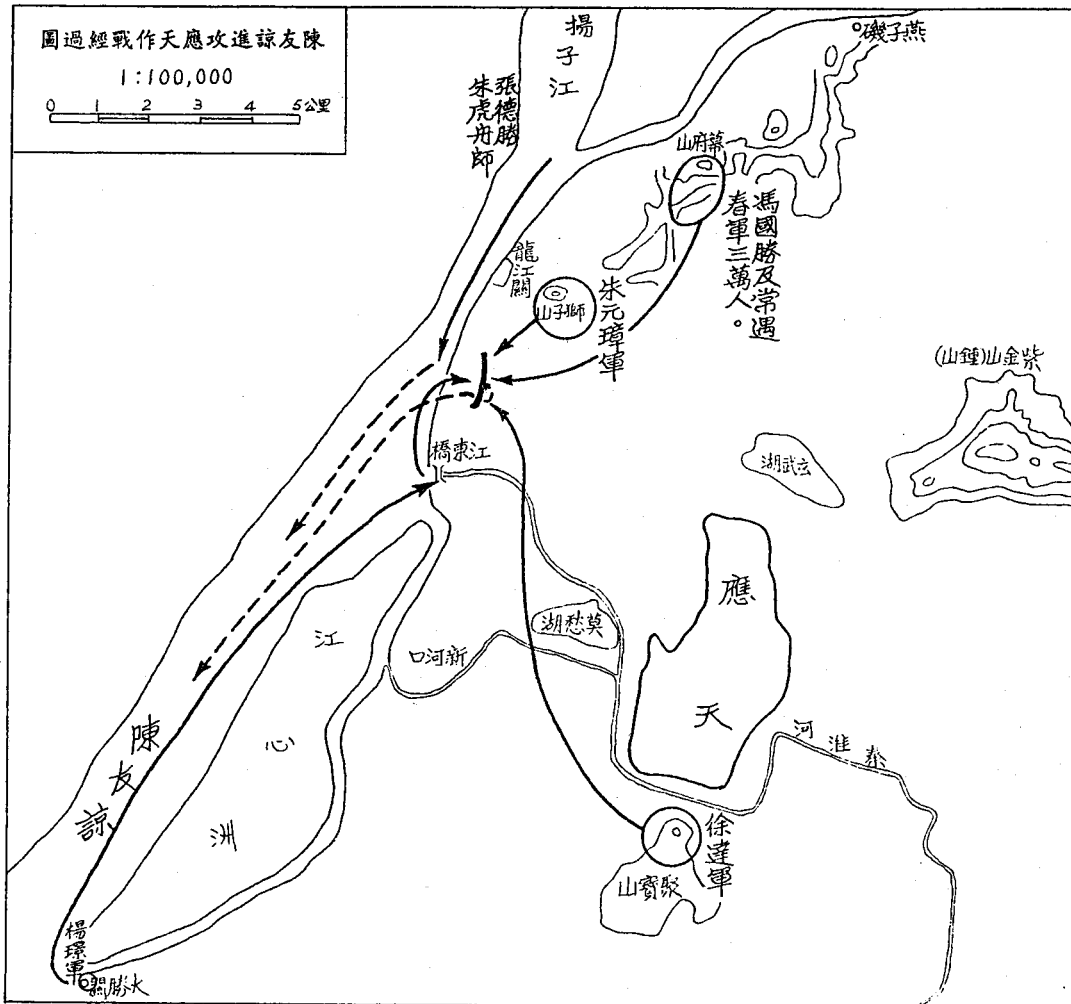
註五〇：《明史紀事本末》，頁三五。

註五一：《國權》，卷一，頁三〇六。

註五二：《朱元璋大傳》，頁一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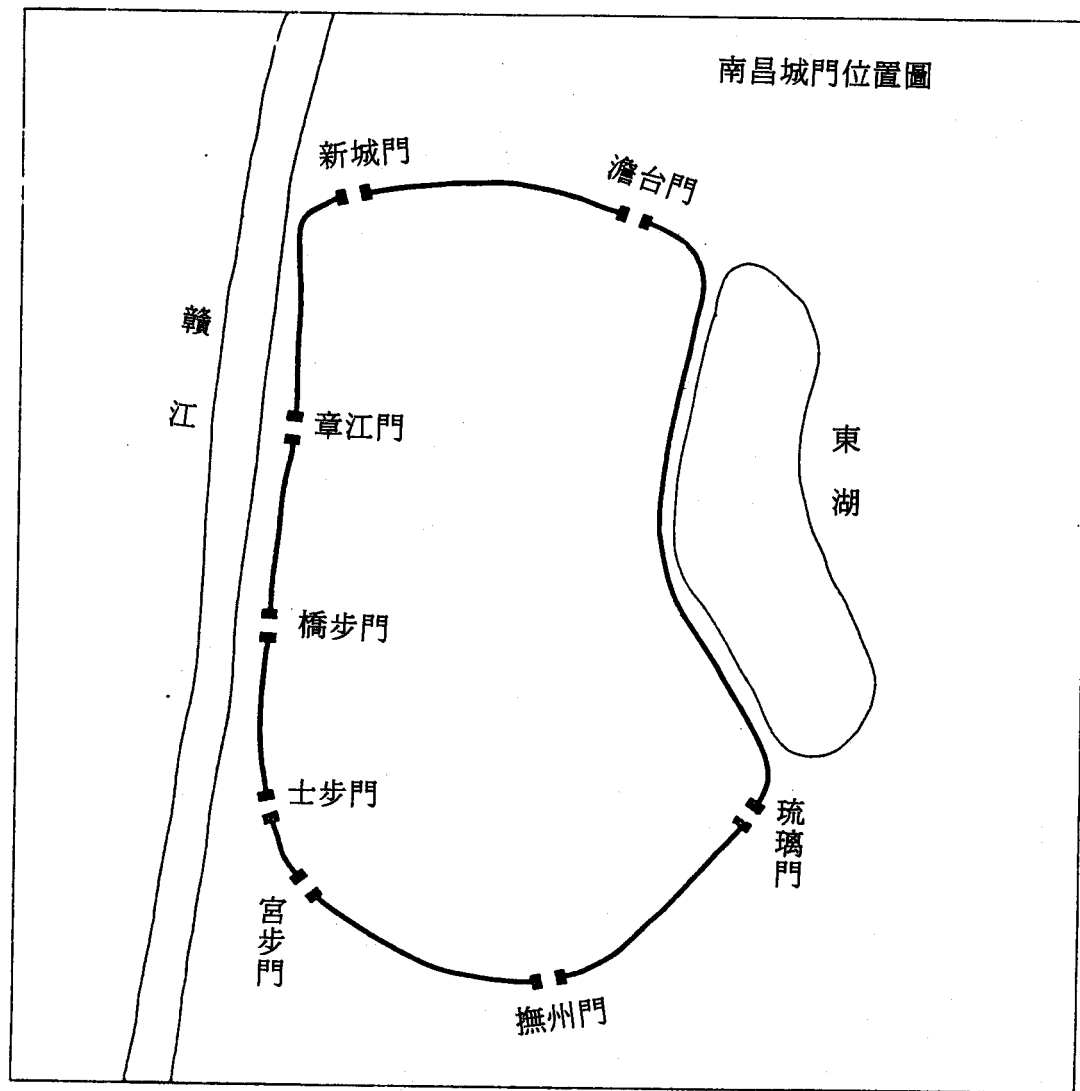
註五三：張德信等，《明太祖周圍的群星》，合肥：黃山書社，一九八八年二月，頁一四一。

附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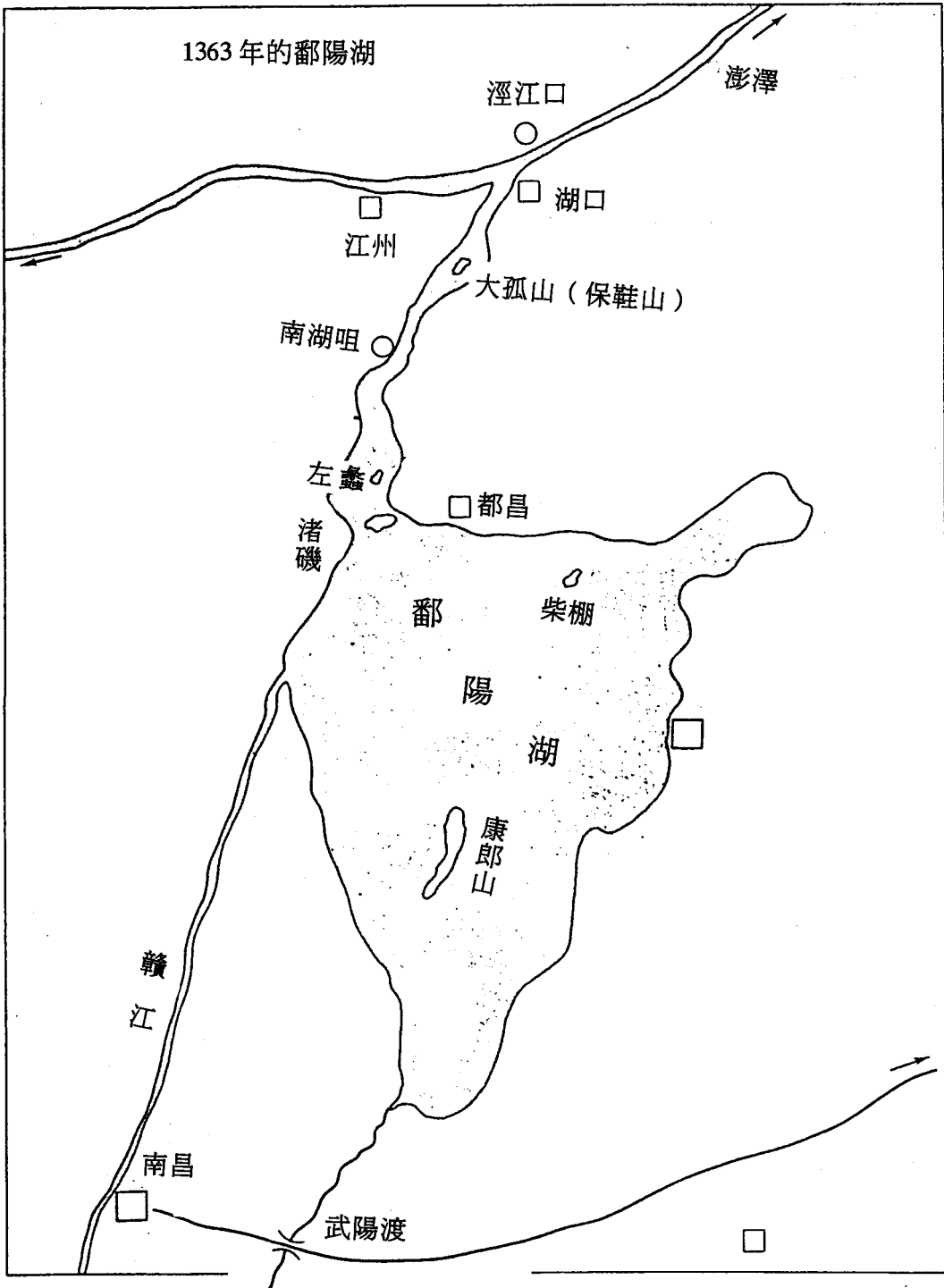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中國歷代戰爭史》，附圖 No.14 - 510.

附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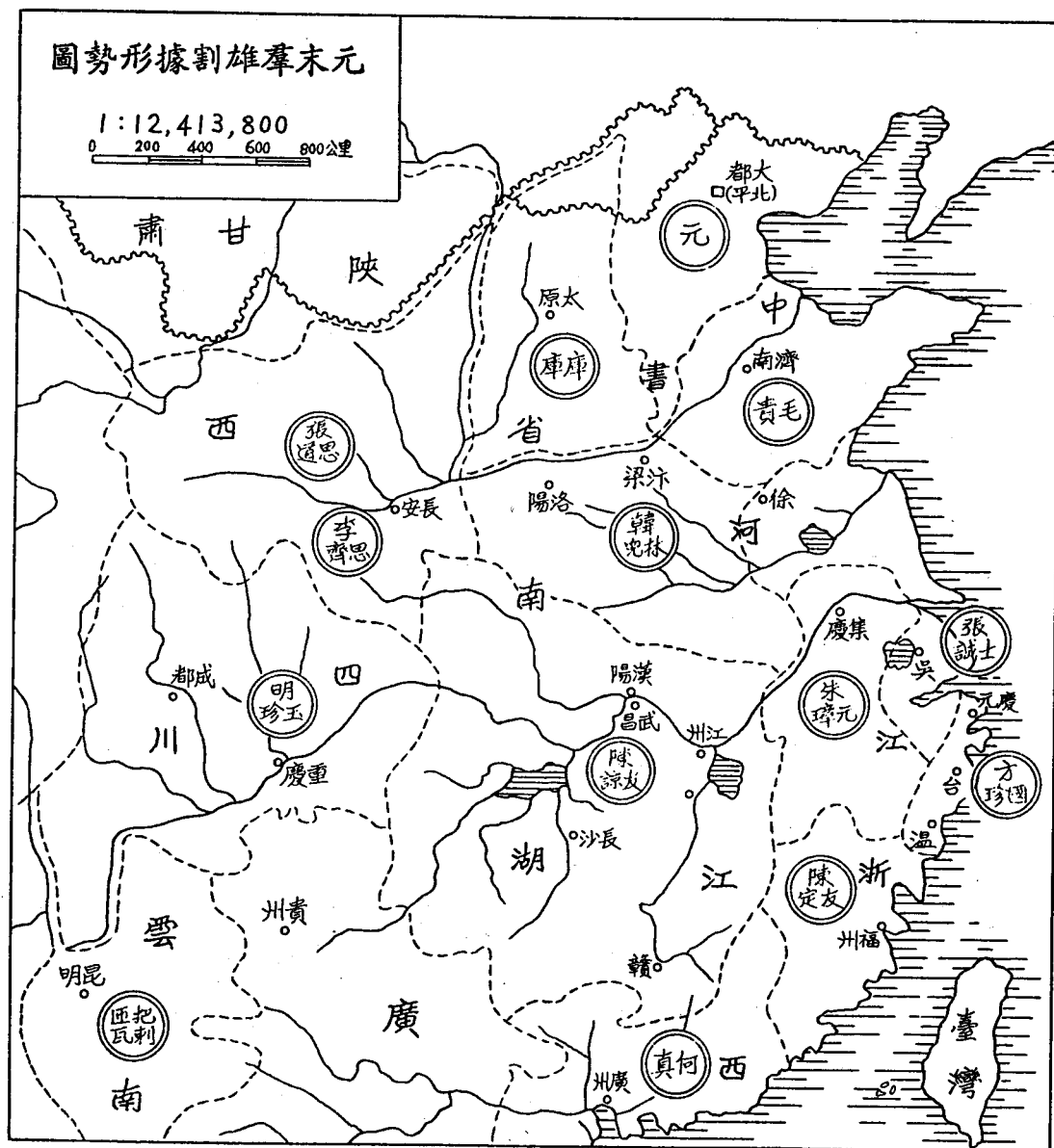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Dreyer, "The Poyang Campaign, 1363", p.208.

附圖三：



資料來源：Dreyer, "The Poyang Campaign, 1363", p.206

附圖四：



資料來源：《中國歷代戰爭史》，附圖 No.14 - 509.